

— 新知研究院丛书 —

东亚经济 蓝皮书

2007—2010年

黄范章 主编

魏燕慎 副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新知研究院丛书 —

东亚经济 蓝皮书

2007—2010年

书名题字：刘诗白

（四川省政协前副主席，新知研究院院长）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经济蓝皮书: 2007~2010 年/ 黄范章主编. —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9-0956-5

I. ①东… II. ①黄…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东亚
—2007~2010 年 IV. ①F1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8914 号

书 名: 东亚经济蓝皮书: 2007~2010 年

作 者: 黄范章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25 号

邮政编码: 100069

发行热线: (010)83910203

传 真: (010)83910203

邮购热线: (010)83910203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c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240 1/16

字 数: 389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956-5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主 任：黄范章

副主任：魏燕慎 徐长文

委 员：赵 瑾 施华强 何 强 陈长缨

宋全成 李培松 白 岩 袁 波

李世刚 李大伟 戴锋宁 李 月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地区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较长时期还依赖于过去的列强，特别是当时称霸世界的美国，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只要美国经济得了“感冒”，亚洲就得“打喷嚏”。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不仅首先有了“四小龙”的经济崛起，而且有东盟推进经济区域化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大改变了东亚经济的面貌。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由于次贷危机引起世界金融危机而成为危机的“元凶”，而东亚新兴经济体和世界新兴经济体一道，成了支持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引起世界瞩目。诚然，东亚经济就实力讲跟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它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值得期待，它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东亚经济的发展途径及趋势值得我们认真跟踪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黄范章曾两度应三井物产集团贸易经济研究所之邀，赴东京作学术讲演，与当时该研究所所长弘中喜捷、特别顾问新堀聪先生和沈才彬研究员有较深厚的友谊，双方深感中日两个一衣带水的东亚大国，有责任也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东亚经济和支持东亚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遂决定合作编著《东亚经济白皮书》，分别用中、日文在两国出版。该书中文版由黄范章、弘中喜捷任主编，由魏燕慎、侯若石及伊滕英司任副主编，由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兼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桂世镛写序，由中国计划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原计划该书每2~3年出版一次，可是翌年，日本贸易经济研究所改为战略研究所，人事也有所变动，《白皮书》的中日合作也便中止。

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地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袭击，但东亚地区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推进经济一体化，重新扬起东亚崛起的风帆，赢得世界银行称道的“东亚复兴”（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黄

范章与魏燕慎合作主编，先后出版《东亚经济路在何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9 年出版）和《东亚经济蓝皮书（2000 ~ 2005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出版），记述了东亚国家（地区）抗击危机以及危机后复兴的历程。21 世纪最严峻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给东亚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但东亚地区勇于应对，把危机转为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的机遇，使东亚经济不仅率先复苏，而且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支撑着世界经济复苏。诚然当今东亚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与战后初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黄范章和魏燕慎再度合作主编《东亚经济蓝皮书（2007 ~ 2010 年）》，力图把东亚地区这段历史的辉煌呈献给广大读者。

这里还须提及两点：一是本书原计划研究的范围仅限于 2007 ~ 2010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一段时期，岂料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及海啸，引起世界各国关注。所以参与本书编写的各位专家也尽可能地把突发事件的影响纳入了视野。二是台海两岸问题不仅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跟东亚地区的稳定及和平发展攸关，我们便把黄范章“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需要两岸实现经济政策合作；推进 ECFA，需以两岸和平发展和和平协议为保障”一文纳入本书专题篇。

本书蒙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博鳌亚洲论坛总顾问陈锦华再次赐序；蒙四川省政协前副主席、新知研究院院长刘诗白教授题写书名；蒙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和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支持及责任编辑王雷女士等协助，我们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编者

2011 年 8 月

序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危机，给东亚和亚洲带来了巨大冲击。尽管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回暖，但不确定因素仍多。奥巴马总统虽宣布美国经济危机的最困难时刻已经过去，但美国经济面对高失业率、高赤字的压力；欧洲虽说开始复苏，但2010年步履趋缓，而且受累于一些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于2010年12月发表《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力度强劲，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尤为突出。据经合组织的预测，东盟六大新兴经济体的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达7.3%。中国2010年经济增速高达10.3%。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在10%~20%，2009年达到50%。国际社会认为，亚洲发展中地区在这次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着“引擎”作用，更有人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诚然，东亚国家和人民不应陶醉在讴歌声中，但事实是经过几十年努力，包括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东亚乃至亚洲发展中地区也都开始崛起，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面貌也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桩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东亚和亚洲发展中地区会有这么引人瞩目的重大变化呢？

这首先应归功于东亚发展中地区各国人民，在摆脱殖民地统治和赢得政治独立之后，用几十年的努力发展本国经济，推行工业化和市场化建设。先是东亚“四小龙”“起飞”，接着是中国和东盟国家接踵“和平崛起”。除此之外，我必须强调，东亚经济的复兴，还应归功于各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东亚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不搞“闭关锁国”，不是闭起门来搞建设，而是敞开门户，引进和利用外部资源跟自身和自然禀赋相结合，缔造出所谓“东亚奇迹”。可以说，透过“东亚奇迹”，却看到它身后绽放着、缔结着“开放”政策之红花硕果。东亚经济

的对外“开放”，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东亚发展中国家为复兴经济，均致力于推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充分利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的时机，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某些业已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从一般加工业做起，逐步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开放政策推进工业化，不仅改变了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也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东亚“四小龙”就是这样于20世纪70~80年代“起飞”，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NIES）。随后，中国和东盟国家也都奉行开放政策，引进来自美欧发达国家以及包括“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以中国为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战略，创建经济特区和在沿海地区实行吸引和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经过几十年努力，在20世纪末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贸易大国之一，建成“两头在外”的世界级加工制造业基地。中国21世纪初加入“WTO”后加速与世界经济接轨，反过来又加速推进国内市场化体制建设。近些年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决定进一步扩大开放，既要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又要加快沿边开放，向西开放，还要扩大内陆开放，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这是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发展机遇的客观需要。

其二，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还体现在开展区域性经济合作上。东盟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决定要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开展经济合作，并于21世纪初不仅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而且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逐步形成了包括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在内的一系列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东亚地区性经济合作并不停留在贸易方面，还向纵深发展：（1）在10+3的框架下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EWS）；（2）在“清迈协议”框架下，在双边基础上建立货币互换机制；（3）在（10+3）和（10+1）框架下建立成员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政策对话机制，实行区域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正是凭借这个开放政策而又不断深化的国际合作，东亚各国联手抗击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确保东亚和亚洲经济在全球视野里率先复苏。

还须提及的一点，东亚地区的各个区域化经济合作体制，也决不是封闭型的国家集团，而是对外开放的。东盟允许成员国各自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经贸合作关系（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分别与美国建立自贸合作区）。特别是，2010年10月28日~30日，在河内举行了东盟第17届首脑会议、东盟与对话伙伴第13次首脑会议以及第5届东亚峰会，与会者除东盟10国外，还包括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东盟对话伙伴国，此外还首次吸收美国、俄罗斯以观察员身份与会，而且决定美、俄两国明年正式纳入东亚峰会。“东盟”扩容了，但东盟仍是东亚区域经贸国际合作的主导者。随着成员国增加，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会相应增多，但开放的主流则是“合作”与“发展”，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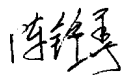
其三，“开放”是经济改革的有力推进器。中国经济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就经济结构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当然跟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但就市场经济讲，两者是相通的，可互为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诞生、成长、发展至今已有数百年。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它是200多年前创立的，当时由24名商人为买卖各州政府发行债券约定定期在纽约曼哈顿南端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于1792年签订一份合同，以后才逐渐由露天交易迁入室内。在200多年时间里，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发展了各种市场（信贷、债券、证券、期货、衍生品等），形成各种相关的法律、规章、规则。至今它已成为一年进行数万亿美元证券交易场所，使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建设，是由而且只能由政府主导，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建成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并且要和世界市场经济接轨。为此，必须坚持“开放”政策，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开放”，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借鉴发达国家关于建设市场经济的经验，而且在实践中“开放”，即在经济改革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实际，为建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各种机制、制度工具、法律、法规与规则，不断探索，不断推进。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我国对WTO的承诺，督促着我们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一切，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成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力推手。

总之，从中国和东亚发展中地区近年来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深刻认识“开放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何等重要：从“开放”中谋

求发展与改革，用“开放”去推进发展与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想从“开放”中谋求发展和改革，多少带有探索性，但经过一段时期，尝到了“开放”的甜头，便主动、积极、自觉地利用“开放”去推进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坚持，应该不离不弃。正因如此，即使在1997~1998年亚洲遭到金融风暴狂虐袭击，东亚国家并未退缩或放弃“开放”，而是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金融监管，依靠“开放”医治伤痛，重新振兴；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虽来势汹涌，但东亚国家还是秉持“开放”政策，联手抗击危机，赢得世界的尊重。我坚信，坚持开放，应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加速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的一项基本国策。

近些年我研究中外各国历史，发现开放政策对于一国的盛衰至关重要。2010年我出版《开放与国家盛衰》（人民出版社）一书，并在序言中写道，“开放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课题。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开放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变。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没有变。”我很高兴看到的是，中国、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如此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表现，正是印证了我关于“开放是国家强盛之道的必由之路”这个信念。黄范章这次要我为《东亚经济蓝皮书（2007~2010年）》写序，我便欣然应笔。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与赞扬。但我们自己一定要看到不足，看到扩大开放条件下种种挑战”，“中国越是开放，越要谦虚谨慎，以建设和谐世界的心态，继续推进开放事业，在开放中认真学习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些话是我在《研究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需要世界的、历史的、发展的视野》一文中（刊《开放导报》2010年第5期）写的。我愿转录于此，与国人共勉之。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博鳌亚洲论坛总顾问）

2011年3月

目 录

第一编 专 题

第一章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趋势及中国的战略思考 ——兼论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黄范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博导、 国际货币基金前执行董事 李大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3
第二章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与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李长久 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	20
第三章	后危机时期东盟经济前景：冲击、对策与前瞻 何 强 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36
第四章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亚洲金融合作 王元龙 天大研究院经济学家、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 田 野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56
第五章	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格局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叶辅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李大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73
第六章	亚洲地区国际货币多元化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张雪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研究员	95
第七章	应对金融危机，需要两岸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推进 ECFA，需以两岸 和平发展为保障 黄范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博导、 国际货币基金前执行董事	106

第八章 东日本强震与世界和东亚经济

魏燕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114

第二编 国别(地区)经济概述

第一章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回顾、评价与展望

宋 立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李世刚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金融学博士 129

第二章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香港地区经济(2007~2010年)

华晓红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学院前院长、博导

郑学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50

第三章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台湾地区经济:表现、成因与对策

李 月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曹小衡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导 175

第四章 低迷的日本经济与不断深化的中日经贸合作

徐长文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所研究员 193

第五章 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后韩国经济发展态势

张建平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邓 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10

第六章 泰国2007~2010年经济发展与应对危机的措施

韩 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231

第七章 后危机时期印尼经济前景:冲击、对策与前瞻

刘均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 242

第八章 马来西亚进入工业化后期社会发展阶段

周小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254

第九章 新加坡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增长

王 涿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 269

第十章 菲律宾经济:2007~2010年回顾与展望

何 强 青岛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286

第十一章	金融危机以来越南经济发展情况及中越经贸关系	
	张 威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	301
第十二章	金融危机后的缅甸经济与中缅经贸发展	
	袁 波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副研究员	319
第十三章	柬埔寨经济发展形势及展望(2006 ~ 2010 年)	
	武 芳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所	333
第十四章	老挝经济形势及中老经贸合作(2006 ~ 2010 年)	
	韩 燕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所副研究员	346
第十五章	文莱经济及中文经贸关系	
	王 蕊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所	358

第三编 东亚经济统计

陈长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377
-----	------------------------------------	-----

第一编 专题



第一章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趋势及中国的战略思考

——兼论日本地震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黄范章^① 李大伟^②

一、“二战”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始于“二战”之后。“二战”之前，绝大多数东亚国家仍然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国经济多处于较为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经贸规模很小。但“二战”之后，东亚各国逐渐成为独立的新兴国家，逐步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经贸联系开始逐渐加强。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之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更为密切，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非常迅速。整体来看，“二战”之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在这一时期，日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战前，日本就是亚洲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考虑，在“二战”后实施了“道奇计划”，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和技术，并向日本开放了其国内市场。日本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外部条件，通过《外资法》、《外汇法》、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实施，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迅速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据统计，1950~1973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29%。1980年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9000美元，已接近

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博导、国际货币基金前执行董事

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也相继开始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经济增长较战前明显加快。在这一阶段，虽然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壁垒程度较高，各国之间的投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日本一些相对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也在此阶段，美国出于“冷战”需要，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八个成员国中只有三个亚洲国家，以“集体防务”为名“遏制”中国。整体来看，这一阶段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时期，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比较优势的转变，其产业发展重心逐渐转向信息技术、电子、精细化工、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从而加快了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向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转移的步伐。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截至1980年韩国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60.5%来自日本，至今日本仍是韩国外资的最主要来源国。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在承接日本的重化工业的同时，也开始将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在劳动力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和东盟）转移。其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力量之一，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支持加工贸易出口等措施迅速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值得重视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6年宣布解散，同年东南亚主要国家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议，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启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一阶段，东亚各大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均明显加强，经贸联系日趋紧密。在这一阶段中，各国政府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色的“东亚模式”，但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

第三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中国。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韩国等东亚国家依靠外债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及金融自由化政策过度宽松等缺陷，中国则凭借其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成为了亚洲经济新的增长重心。特别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大量欧美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的跨国公司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以欧